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至巨。沉重的苛税是农民离村的首要原因;次则为马家军阀抓兵拉夫;此外天灾频繁、外货涌入和战祸频仍也是重要因素。斯时农民离村后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进入城市做工、住家、逃难和求学,部分转入它村继续垦荒,或转入土匪的行列。农民离村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增添了城市生存压力,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但离村者向故土回馈资金和技术,又通过创办杂志积极传播新思潮,对促成甘宁青社会向近代化进发起到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民国;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883(2009)01-0127-05

农民离村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但甘宁青地区的农民离村问题目前尚未有专文出现。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甘宁青地区的农民离村有其自身的特性,对三省农民离村的致因、去向及社会影响进行探讨分析,无疑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进路。

一、甘宁青农民离村的致因分析

20世纪30年代,甘宁青农民离村达到了高潮。此时农民离村的原因,据实业部的调查,主要如表1所示:

表1 甘宁青农民离村之原因(%)^{[1](179)}

省名	农村经济破产	耕地面积过小	乡村人口过密	农村金融困敝	水灾	旱灾	匪灾	其他灾患	贫穷而生计困难者
甘肃	1.7	—	—	—	7.6	18.5	15.1	5.9	11.7
宁夏	—	—	—	—	—	—	—	20.0	10.0
青海	3.1	—	—	—	6.2	12.5	3.1	28.1	21.9
全国	3.8	3.7	3.6	2.6	9.8	13.2	14.3	6.8	18.2
省名	捐税苛重	租佃率过高	农产歉收	农产物价格低廉	副业衰落	求学	改营商业或其他职业	其他	不明
甘肃	19.3	—	10.1	1.7	—	1.7	0.8	5.9	—
宁夏	60.0	—	—	—	—	—	—	10.0	—
青海	9.4	—	3.1	—	—	—	—	12.5	—
全国	4.8	0.6	3.7	1.5	0.5	2.9	1.6	7.0	1.4

根据上表调查,甘宁青三省农民离村的原因中,捐税苛重当为第一,宁夏和甘肃分别处在第一位,分别为60%

收稿日期: 2008-10-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08JC770020); 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西北边疆民族与生态变迁研究”(NWNU-KJXGC-03-2)

作者简介: 尚季芳(1976-),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

和 19.3%，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 55.2 和 14.5 个百分点；青海的苛税虽不在第一位，但也位居第四，占 9.4%，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4.6 个百分点。其它原因则集中在旱灾、匪灾、贫穷而生计困难等方面。饶有意味的是青海和宁夏两省的其他灾患致农民离村达 28.1% 和 20%，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1.3 和 13.2 个百分点，其中缘由是马家军阀的征伐苛派、抓兵拉夫所造成。总括之，甘宁青三省农民离村的原因是天灾和人祸，人祸大于天灾。

(一) 烟亩罚款与农民离村

民国甘宁青经济发展迟缓，财政收入不敷出。政府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将征收烟亩罚款（宁夏称清乡费）作为挹注军费，维持行政开支的主要手段。1934 年，甘肃省 58 县烟亩罚款总数为 4 524 000 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2] (31-32)}。宁夏 1932 年财政收入 332 万余元，而当年的清乡费就为 154 万余元，几占一半^{[3] (217)}。青海无确切统计材料，但马步芳和马步青占据甘肃河西地区，确以烟款购买枪支弹药，维持马家军的生存。此种罚款，“政府先视财政支出及各种税收不足各有多少，然后定一主观上的总额，根据此种总额，分配各县，必令县长如数征收”^{[4] (26457)}。且此类征收给县长有 5% 的提成，征数越多，提成越多，县长也乐于从事。武都县长公开说：“武都的农民，名义上担负赋税十一万元，实际上一百三十万元亦不够。”^[5]

当农民被烟款逼得走投无路之际，他们不得不请求省政府体恤民情，减免亩款，但政府多以军费无着，财政拮据为由拒绝。1936 年，漳县公民代表上书，指出该县人民负担沉重，逃亡他乡者络绎于途，请求禁绝烟亩，恢复生产，“现以春耕将届，群欲将全县烟亩，提前禁绝，于国家早除其鴆毒，于人民顿弛于负担，诚属公私交相便利”。如不能提前禁绝，“亦惟恳俯念兵荒子遗之灾黎，饥寒交迫，日不聊生，祈减轻烟亩罚款，稍纾燃眉。民亦各具天良，愿忍一时之痛苦，弹出竭入，共济时艰。”^[6]对此血泪请求，省政府批复道：“查该县禁种，列在第四期（即二十七年），前经呈请委员长蒋核定在案，未便变更。”即漳县未到 1938 年禁绝鸦片的期限，所以不能提前禁种。省政府的如此解答，显然不是禁烟，而是纵毒。从档案资料看，当时上书请求减免亩款或提前禁绝的县份不在少数，如礼县、安西和武威都有呈文，但都以相同理由拒绝。事实上，此一时期，省政府倾其全力征收烟款挹注财政，都时有不虞，何谈减免，提前禁种更是难得实行。在亩款日日进逼的当下，农民只有选择逃离一途。

(二) 临时摊派与农民离村

民国时期，县财政无独立地位，县级及以下地方机构的经费相当有限。就甘宁青三省而言，县财政收入主要以田赋附加和临时摊派为主，而以后者为大宗。1935 年，甘肃省各县岁入预算中田赋附加和摊款的比例分别占 20.9% 和 45.63%，后者几近县财政收入的一半^{[7] (1021-1022)}。为进一步说明摊款在县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再以甘肃省皋兰县 1926—1931 年田赋正附税合计和摊款的比率情况为例，见表 2。

表 2 皋兰近六年全年田赋正附税合计与临时摊派之比例^{[8] (7235)}

税别	1926 年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正税	78 718	78 718	78 718	78 718	78 718	78 718
附税	36 680	36 680	36 680	36 680	36 680	36 680
合计	115 398	115 398	115 398	115 398	115 398	115 398
摊款	969 098	874 326	810 211	599 358	685 482	315 184
比率	1 8.39	1 7.58	1 7.04	1 5.19	1 5.94	1 2.73

观表可知，从 1926—1931 年，皋兰县的财政收入中，大宗款项以摊派为主，最多为 1926 年，该年正附税为 115 398 元，而摊派高达 969 098 元，比率为 1 8.39。最少 1931 年，该年正附税为 115 398 元，摊款为 315 184 元，比率为 1 2.73。此后 1932 年比率为 1 1.65，1933 年比率为 1 4.16，1934 年比率为 1 3.36，1935 年比率为 1 3.44，1936 年比率为 1 1.55。总体上二者的比率呈下降趋势，但摊款数目一直居高不下。上述例证，说明县财政收入中临时摊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舍此县财政无法运转。然而临时摊派是一种更为扰民的残酷的非法筹款行为，时人指出甘肃“农村破产，农民流亡，其天灾自然以及政治原因不计外，仅从农民负担上言，以致促成今日现有之现象者，不在田赋负担之繁重，亦非附加之多额，乃既不属于田赋范围，而仍按亩之临时摊派是”^{[7] (10218)}，此语可谓中的。

(三) 抓兵拉夫与农民离村

终民国一代，政局混乱，军人当道，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都将军队作为维护其实力的基础。坐镇宁夏和青海的马家军阀也深谙此道，抓兵拉夫扩充军队不遗余力。1937 年以前，国民政府不准马鸿逵私自向地方拨壮丁，扩充军队，而马鸿逵则阳奉阴违，偷偷摸摸地征了 3 次兵。抗战开始后，因着抗日的名义，马鸿逵大肆扩兵。1937 年至 1940 年，每年征一次兵。1940 年以后，则往往每年征兵 2 次。从 1941 年到 1948 年的 8 年中，共征兵 12 次。解放前夕，宁夏人口约 75 万人左右，而马鸿逵的军队总数约在 10 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 7 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征兵成为宁夏人民的又一灾难^{[9] (129)}。马家军阀在征兵初期，规定每户有 18 至 25 岁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后

改为 18 至 30 岁;再改为 18 至 40 岁;最后,兵源枯竭,竟改为 15 至 55 岁。先是按壮丁抽,后改为按丁抽,征兵已不择手段,且“当了马家兵,就别想脱身见娘亲,就豁出一辈子当老兵、胡子兵、没有一个敢逃跑的。如果逃了抓回来,鞭打绳吊,十分残忍可怕。”^{[10] (215)} 残酷的征兵使人民如入水火,采用各种手段逃避。征兵期间,有钱的雇佣充数;贫民有些用刀刺破眼球、砍掉食指,用石头砸掉门牙,用巴豆糜烂下身或肛门假造梅毒等自残手段以逃避兵役^{[9] (130)};有些则举家逃亡,流落他乡。一首青海民歌唱道:“哎——有的尕娃(哈)打发者走皋兰,下坡子去了(者)卖纸烟;有的人走了洮岷州,下苦讨要(者)度光阴;有的人走了拉卜愣,黑错里也跑去一层人。”^{[11] (191)} 反映的是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老百姓在面对抓兵时,无奈把青年子女送往外地,躲避差役的悲惨境遇。

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除上述主因外,还有一些因素。地震、干旱等天灾的频繁发生,造成流民到他省求食。外货入侵,对地方原有的手工业破坏严重。甘肃临夏地区,“洋布的倾销,迫使十余家土布棉布商倒闭;哈德门纸烟的倾销,逼得八九家水烟铺关门;日用百货的大量输入,挤垮了六家百货小商店”^{[12] (172)}。战乱接连不断,也迫使农民无家可归,远走他乡。综上观之,甘宁青农民离村致因不外天灾与人祸,所谓烟亩罚款、苛捐杂税、抓兵拉夫和战乱相继等都是人为的结果,天灾虽时常发生,但人为的恶果加剧了灾害的严重性。因是之故,我们认为甘宁青农民离村人祸大于天灾,时人也指出“西北灾荒之来,非旱灾水灾之过,乃横征暴敛之过”^{[13] (86)},可与此观点相佐证。

二、甘宁青农民离村后的去向分析

当农民被烟亩罚款、苛捐杂税等逼得走投无路之际,只有离开故土一途。1934年,临泽县派款 114 000 元,“民众无力交纳,纷纷逃避”^{[14] (85-86)}。安西农村“十之五六已无人烟”^{[15] (148)}。据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20 世纪 30 年代甘宁青三省农民离村后的主要去向如下表所示:

表 3 全家离村之去处所占之百分比 (%)^{[11] (177)}

省名	到城市 逃难	到城市 做工	到城市 谋生	到城市 住家	到别村 逃难	到别村 务农	迁居 别村	到垦区 开垦	其他
宁夏	9.4	15.0	10.5	6.6	21.9	14.0	8.8	2.5	11.8
青海	13.7	15.9	14.1	8.1	10.3	18.6	8.3	8.8	2.2
甘肃	12.1	20.1	10.9	6.2	11.2	18.2	10.4	3.9	7.0
全国	14.2	21.3	15.4	8.2	7.7	17.3	7.4	4.5	4.0

再看下表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向:

表 4 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所占百分比 (%)^{[11] (178)}

省名	到城市 做工	到城市 谋生	到城市 求学	到别村 务农	到垦区 开垦	其他
宁夏	24.4	9.4	9.1	46.5	1.2	9.4
青海	23.5	19.1	13.9	25.5	15.9	2.1
甘肃	24.4	14.9	14.4	30.6	4.2	11.5
总计	27.7	20.1	17.5	22.6	5.9	6.2

分析第一表可知,甘宁青三省全家离村到城市者分别为为 49.3%、41.5%和 51.7%,包括到城市逃难、做工、谋生和住家;到别村者分别为为 39.8%、44.7%和 37.2%,包括逃难、务农和迁居别村;到垦区开荒者分别为 3.9%、2.5%和 8.8%;其他因素分别为 7.0%、11.8%和 2.2%。第二表青年男女离村的去向仍以到城市为主,三省所占比率依次是 53.7%、56.5%、和 42.9%,包括到城市做工、谋生和求学,但三省均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65.3%,相反到别村务农的比率三省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省城市化进程缓慢,吸纳离村农民的数量有限。

总体而言,进入城市是农民离村后的首要选择。除部分地主乡绅离土定居城市、一些知识青年进入城市求学外,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后的主要工作是当工人、矿工、人力车夫、挑水夫、粪夫、泥瓦工和卖柴草等。到别村务农或打长工、短工也是离村农民主要的谋生手段。在甘肃榆中县,农工常有常工、月工和日工之分,其中常工“即农家雇有力之苦工,以作常年管理农场者之谓,充该工者,多为外县人,其工资年六十元之谱”^[16]。此外,还有一些离村农民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入开垦荒地务农,求得生计。如陇南和陇东一带,“农民都尽量开荒,耕地已开至山顶,如顺着天兰公路(天水至兰州)来看,遍山都是梯田。”^{[17] (76)} 另外,民国时期甘宁青前往外省谋生者也在多有,进入新疆者最多,如敦煌农民因“兵匪拟扰,差徭繁重,全家避往新疆,近五年络绎不绝”^{[18] (193)}。

到城市做工和到别村谋生虽解决了部分农民的暂时需要,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实际上,当时还有众多离村农民处在失业之列。为了不被饿死,他们必须寻求另外的谋生之道,一个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进入社会次生群,充当土匪。前表中甘肃农民离村去向“其它”因素高达 7%,宁夏高达 11.8%,而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为 4%,宁夏

居全国第一,甘肃居全国第四。笔者认为这一部分离村农民很有可能被迫从事上述行当。

土匪来源于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人祸等的直接产物。民国甘宁青匪患迭出,正是人祸和天灾将农民逼上了不归路。有人认为“陇东的土匪,不外陇东无职业子弟,生路断绝,挺(铤)而走险,天灾人祸逼迫造成的。”^{[19](36)}的确,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当土匪确实能缓解贫穷的压力。有人看到西北土匪众多,说了一段很有趣味的活:“我们试试看,土匪的生活是如何?穿的呢?绸东缎西,吃的呢?大肉海饭,骑着大马,打着洋枪,去到一处,没跑脱的人,谁不叫声‘老爷’!见了美好的姑娘和少妇,便可很自由的奸淫。……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何不见异思迁呢?当土匪去,最低限度,能够把肚皮弄饱,也还没其它的义务(出差事)纠葛,所以我说‘当土匪是生活的挣扎。’”^{[20](60)}这句话虽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其中反映的严酷事实值得思考。

三、甘宁青农民离村的社会后果

(一)农民离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落

当农民离开故土之际,即是抛弃土地之时。沉重的苛税,使得农民弃地不种者比比皆是。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其生活的保障,然而,在甘宁青农村,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作一种负累,田产越多,赋税愈重。李扩清在河西做了调查后,痛心指出:“农民视土地为累害,多相率弃地逃亡。”^{[4](26414-26415)}青海乐都张家镇“向例租田一斗,年纳租麦三斗,粮款种子,概归佃户负担;今则请人租种,免纳租麦,仅望代负粮款,亦绝无人敢应命。”^{[18](128)}种种事实表明耕种土地已得不偿失。

在农民离村,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当下,诸多的土地被抛荒,地价首先下跌。宁夏广武堡:“堡外田地,多未耕种。……地价每亩前售三十元,今因差捐苛繁,欲售五元,犹无顾主。”甘肃安西县“地价奇跌,上等土地之最高价,每顷只值六十元(约合一元一亩),其中下等田地,即倒贴耕牛、房屋、器具等,尚无人承种,甚有倒贴少女,或青年孀妇(马仲英任意抓兵拉夫,故关外三县,孀妇甚多),以与承耕人为妻之事”^{[18](93,187-188)},田地累人,竟至如此。

土地无人耕种,导致了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敦煌县1911年至1932年,小麦和大麦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大麦的普通价格由3元涨到20元,最高价达到23元,最低价也为17元;小麦的普通价格由16元涨到17元,最高价格为22元,最低价为19元^{[21](152)}。缺粮局面的形成,粮食价格的上涨,随即影响到农家的生计,整个甘肃的农家都处在饥寒交加之中,富家变贫,贫家变无或破产,“昔称巨富素封者,今则无盖藏之富。昔之仅足衣食者,今则变为乞丐。”^{[13](89)}此种现象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情态。

(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生存压力,城市社会问题增多

前已述及,进入城市是离村农民的首要选择。他们进城之后,参与城市的各种行业,为城市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如1935年3月,对兰州市各业工人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工人来自于离村的农民,当时共有工人3854人,其中水夫732人、浴业79人、鞋匠426人、裁工330人、理发175人、茶馆114人、戏剧171人、骡车夫340人、洋车夫153人、担贩374人、厨业509人、乐户451人^[22]。还有部分离村农民进入工矿企业,如甘肃水泥公司的很多辅助工人大多是从甘肃永登县及青海民和县、乐都县农村招募而来^{[23](106)}。这些离村农民进入城市,用自己辛勤劳动为推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和工商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并非城市的近代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自觉进入城市,而是由于农村的天灾人祸等恶劣因素把农民强行推出故土,因此进入城市者也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很难寻找安身立命之所,除一部分幸运者或有一定手艺人能勉强得到一份工作外,大部分的农民还是流浪于城市的街头,以乞讨为生。

还有一些进入城市无法就业的农民,妇女转入了妓女的行列,靠出卖肉体苟延残喘。兰州市妓院林立,大多设在今天南关一带^{[24](69-70)}。宁夏“城内暗娼,著名者达三四百家,皆为生计所迫,操此皮肉生涯。”^{[18](94)}而一些无法就业的男性,变成扒手,他们“小则偷偷摸摸,窃得财物,苟且偷生,大则持械行凶,进行抢劫。”^{[24](71)}总之,进城的农民给城市近代化作出些许贡献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显性和隐性的生存威胁,引发了诸多不和谐的社会问题。

(三)进城农民和出外求学的青年从物质和观念两方面影响着甘宁青社会的变迁

随着地域的转移,从事职业的变化,新领域的接触,使得进城的农民和知识青年逐步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改造桑梓之情油然而生。从简单层面来看,资金和技术回流是其对家乡的最直接回馈,这一方面缓解了农家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将新技术播撒到农村,促生了农村生态结构的变迁。抑有进者,留学在外的青年,组织同学会、同乡会、创办刊物,向外人宣传故土真象,向桑梓传播新思想,促其变革。

甘肃旅渝同学会创办的《陇铎》杂志,影响颇大。主编庞敬修认为该刊的主要任务是“一、介绍现代学术思想,促进桑梓文化建设;二、为甘肃大众说话,不是为少数人自私自利打算。”^{[25](5)}宁夏留平学生会创办的《银光》《宁夏曙光》,也积极为桑梓建设服务,诚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是宁夏的智识阶级,同时也是百余万父老兄弟姊妹争自

由与生存的前锋,虽然我们的能力,微薄到不能权衡,但我们有热血,有头脑,和大无畏的毅勇,为了在这万恶的社会上——在我们黑暗的地域里,找光明,找真理,我们是不怕牺牲的,即或是所有的一切。”^{[26](2)}这些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以促进家乡的建设为主,其献言献策均具有前瞻性,地方当局的主政者也极为重视。

甘宁青离村农民和旅外学生,充当了城市物质文明的载体和城乡交流的媒介,对打破甘宁青传统社会格局,促进地方社会在物质、社会和观念三个层面上的变迁作用至为明显。

四、结语

民国以降,甘宁青三省财政困窘,维持社会运转的新经济增长点始终没有培育起来,社会处在一种恶性变迁当中。因之,政府、军队、地方基层社会以及社会次生团体诸如土匪等靠一些非法手段谋取经济收入,如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或无休止地临时摊派等等,加之天灾的频繁,致使社会底层的生产者无喘息之机。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渐离开故土,以进入城市做工、居家、求学,到别村开垦,当兵或者当土匪为主要谋生方式。农民离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落,土地抛荒和地价下跌现象严重,粮食短缺,粮价上涨,农家生计维艰;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客观上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又给原本脆弱的城市以更大的压力,城市社会问题突出;转入社会次生群体的士兵和土匪,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但另一方面,离村出外求学的学子通过创办杂志,发表言论,瓦解着甘宁青传统社会格局,推动其向近代化迈进。总体上看,离村农民既阻碍又促成着甘宁青社会的变革,这是由民国社会经济不发展,社会处在转型期这一总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对甘宁青农村的发展及其未来态势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 [1]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印.农情报告[J].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5日.
- [2] 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择要报告[R].甘肃省图书馆藏,1936
- [3] 国民党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编.宁夏省人文地理图志[Z].1936年印行.
- [4] 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M].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 [5] 孙友农.甘肃农业问题回顾(一)[J].农业推广通讯,第5卷第3期,1933年3月.
- [6] 漳县公民杨炳均等函提前禁烟或减亩款[R].档号15(全宗号)-7(目录号)-141(案卷号),甘肃省档案馆藏.
- [7] 何让.甘肃田赋之研究[M].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 [8] 张联渊.皋兰田赋之研究[M].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 [9] 陈育宁.宁夏通史·近现代卷[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 [10] 张登元.民国时期的兵制演变和马家队的抓兵酷刑[A].酒泉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M].1996
- [11] 周旺盛演唱、王沛整理.韩起功抓兵[A].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M].1989
- [12] 马效融.河州史话专辑·清朝时期的河州·外国资本进河州[J].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M].1994.
- [13] 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 [14] 通讯·临泽公款浩繁民多逃生[J].旭光,第1卷第1期,1935年5月20日.
- [15]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16] 王智民.榆中县易平乡农村概况[J].西北日报副刊·合作专刊,1935年10月18日.
- [17] 李化方.甘肃农村调查[M].西安:西北新华书店发行出版,1950.
- [18]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甄喙,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19] 杨子恒先生在陇东旅兰各界欢迎会上之讲演词[J].崆峒,第2期,1933年11月10日.
- [20] 痕.零笔碎墨(十四)[J].党锋,第11期,1930年8月.
- [21] 高良佐.西北随记[M].雷恩海、姜朝晖,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22] 本市工人调查,水夫人数最多[J].西北日报,1935年3月24日.
- [23] 张思温.甘肃水泥公司的三起三落[A].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M].1990
- [24] 旧时代兰州妓院点滴[A].范宗湘.一个旧警官眼中的旧兰州[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 [25] 庞敏修.本刊周年纪感言[J].陇铎,第2卷第1期,1940年12月15日.
- [26] 宁夏留平学生会编印.宁夏曙光[J].第1期,1932年4月15日.

【责任编辑 谢海涛】